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三期 ——
(二〇〇八年八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8a)

【研究资料】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阎长贵
【回首历史】	也谈罗瑞卿事件	仰天长啸
【当事者说】	我们写信告迟群	唐少杰
【文革一幕】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王文正·沈国凡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资料】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 阎长贵 •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这篇社论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二人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的谈话写成的，或者说，这篇社论是传达和宣传毛泽东生日谈话的精神的。被邀参加这次生日家宴的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场），而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在这次生日家宴上，毛泽东讲了一大篇话，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了，

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693—695页）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注）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看，这就是毛泽东的生日家宴！它简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和必须“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说：“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见1462页）这确实是毛泽东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一次突出表演和表现。

到这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泽东所以在这时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城乡更广的领域推开，即“将阶级斗争搞到全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和企求的全国“大乱”，说文雅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元旦社论传达毛泽东的声音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十分显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毅然决然地自作主张地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 “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谁？

“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社论的号召，针对性很强。其矛头指向谁？形势表明，明显地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的陶铸；因为到这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面人物被打倒了，林彪虽然是接班人和唯一副主席，但他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社论说：“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那是指何人？当然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从上到下的广大的各级领导干部，其领军人物，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陶铸。据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697页）

周恩来和陶铸反对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吗？也不是。但他们认为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民以食为天”，生产搞乱了，经济基础动摇了，七亿人民“喝西北风”？！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布置和指示谷牧、余秋里召开工业座谈会，搞一个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谷牧、余秋里听取各方面意见，搞的“汇报提纲”（《十五条》）否定和推翻了陈伯达、王力在“安亭事件”后奉命起草的这方面的文件，——用陈伯达批评谷牧的话说：“你们

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毛泽东对谷牧等搞的“汇报提纲”不满意，又叫陈伯达、王力重搞，这就是12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12月15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一方面发布文件决定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同时开会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从此陶铸也就靠边站了，其后，不到一个月，陶铸就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中点名，公开打倒。这是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谈话和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主要历史背景。

◇ 毛泽东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不是偶然的，是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推向极端和绝对

毛泽东在1966年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发动和进一步扩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极端和绝对化。“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和荒谬绝伦的地步。

多年以来我们有个习惯说法，叫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说法，仿佛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不重视或不提阶级斗争了。事实似不是这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无疑会有时紧些，有时松些，但从来没有断过。毛泽东说他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拿来四个字：“阶级斗争”。此话不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地找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症结，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了政权，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继续不断地、甚至变本加厉地、并且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认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结果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诸如1957年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一直到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几近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也就是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教训很多、很深。这教训之一，概括地讲，1957年前，我们搞了不少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从1957年起，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搞的都是主观制造的人为的阶级斗争。关于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毛泽东自己有个说法，叫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恰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我觉得，这样说，即“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可能比“重提阶级斗争”的说法更好些，更符合实际些。

从1957年起，毛泽东多次论述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论述他的阶级斗争理论。

1957年6月，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正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仅仅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推翻了这个论断，重新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

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1958年，毛泽东不仅重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提出了中国现在还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写进了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全党的共识昭示于众。

1959年，毛泽东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内容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的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1963年，毛泽东在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并被写进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964年12月15—2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了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国工作会议，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下面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在上面的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时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又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9—1460页）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前和开始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几段重要论述。可以看到，毛泽东在1966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是同他以前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是他以前的阶级斗争观点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在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后，又提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实际上，是指整个上海的夺权，“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版第185页）并用这种观点，解释整个文化大革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页）

毛泽东在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阶级斗争的估计和观点，大体就是这样。在建国后，特别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说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是可以的，但毛泽东不这样看，反对这样看。顺便说一句，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存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参见2007年9月17日170人签名的《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阶级斗争，不仅党外有，党内也有，更重要的是党内；下层有，上层有，更重要的是上层，特别是中央；农村有，城市有，更重要的是城市；阶级斗争贯穿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总之，处处都有阶级斗争，时时都要进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全面阶级斗争”观。毛泽东的“全面阶级斗争”观，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用它指导行动和运动怎能不制造一个又一个灾难？！

毛泽东提出和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最高指示一落实到行动，诉诸狂热的造反群众，也就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夺权”的阶段——文化大革命最灾难性的阶段。

—————

注：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2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惟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页）。

□ 《炎黄春秋》 2008年第5期

~~~~~

## 【回首历史】

也谈罗瑞卿事件

• 仰天长啸 •

近来读了余汝信先生的《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感触良多，该文的确是好文章！

关于罗瑞卿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说过：“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尽是乱说一顿，你们要是能找到叶帅的讲话，什么都清楚了，叶帅讲的清清楚楚；……杨成武是最大的积极分子，在罗的问题上却推得干干净净”。叶帅的讲话余汝信先生找到了，叶帅讲的确“清清楚楚”。叶帅的讲话很长，这只是一小部分。

正如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所说，批罗的会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叶帅说“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有九十五人，除了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参加会议的有九十五人中，具体有多少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尚不得知，但现在官方和“蹩脚的文革史工作者”，却把责任推给林彪（北京的会，上海的会，林都没有参加，也没有指导、遥控会议，更没有讲话）、李作鹏（李只有书面发言，想“风光”没“风光”上），邱会作（邱主要讲大比武的浪费问题）和吴法宪（吴已撰有回忆录），这是不公平的，更不是事实求是的。八十六篇发言稿，减去李、邱、吴三篇，还有八十三篇，这八十三篇是些什么内容？又是些什么调子呢？叶帅讲的很清楚：“差不多全部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另外，这八十三篇的发言者，是少将、中将多呢？还是上将、大将、元帅多呢？其实，在批罗的会上，大家发言都很积极，肯定是“重臣”、“大人物”优先。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说：“能在批罗的会上发言，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你资格不够，还未必能轮得上你‘风光’。”

批罗的会议是在干什么？说是在批判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实际上是冲着林彪推荐的总长罗瑞卿来的，冲着“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优秀人物来的，也是冲着“双一”来的。在中国革命的队伍中，尤其是在军队中，“山头主义”的影响是很大的，“双一”，尤其是原红一军团的干部，在部队的主要部门都是当家的，吃香的，不少人有优越感。罗瑞卿是第一个从“双一”开小差的，也是第一个“双一”落马的重臣、“大鳄”。对于罗的倒台，第一个输家就是林彪，罗给林丢了脸，只有让大家出气吧，要说“惋惜”是林。“愉悦”的也大有人在，其他山头的人，挨过罗整的人，看林彪笑话的人，也有杨成武。因此，罗的问题现在整个都给搞反了！这有官方为了政治需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罗瑞卿、杨成武这些人说了不少假话造成的。如果没有林彪提议他当总长，并安排了很多要职（比粟裕、黄克诚两任总长多的多），罗在政治上决不可能这么“风光”，这么红极一时。十个大将，大都比罗资格老、战功大，可谁都没有象罗这么“风流倜傥”过。其实，把倒罗“罪名”推给林的，一个是毛，一个就是罗瑞卿本人，因为罗复出后既不敢反毛，也不敢公开和当年的批斗他的积极分子叶剑英、杨成武、聂荣臻、萧华等人翻脸，因为这些人在中共还有一席之地，所以只有把矛头对准已倒台的林彪。

罗瑞卿问题的发生、发展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五九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因为林身体不好，也不愿意事无巨细的当掌柜的，林提议罗瑞卿当总长，罗是毛和林都信任和赏识的人，能力、资历、军衔都够，又出身“双一”，罗的确是极为适合的人选。林给罗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赋予重任，使罗“大权

在握”，放手让罗干。罗实际上就是仅次于林彪的军队的二把手。林是个不管小事的人，事事都来汇报，林也未必愿意听，一般的事不来汇报，林也无怨言；罗开始也无“封锁”林之心，和后来有意封锁林，背着林干事还是两回事。

但罗变化太快，有了重权高位，很快就有些忘乎所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目中无人，连老帅都不放在眼里，甚至有人说罗“狗仗人势”。为此林对罗很生气、很在意，罗毕竟是他推荐的，林不愿意别人看笑话。林对罗的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的，是把罗当成自己人来看待，林对罗“矫枉过正”之处也不见得没有，军人嘛，老上级嘛，说就说了，骂就骂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红色家族档案》中引用过叶群的话，叶群对罗说：“他（指林）是把你作为亲密的人才给你发脾气的嘛。”叶群本是好意，不过罗点点在书中却是作为贬义来引用的。

关于罗的作风，说句难听的话，也是毛、林给惯的，罗是毛、林的人，优越感太大。其实早在延安时，罗当抗大教育长，他那特殊化的作风，大家意见都很大。为此毛到抗大开座谈会，张爱萍、谭家述、韩振纪等人发了不少牢骚，说罗太特殊，罗的马料比他们教员的伙食费还高；说罗在生活上对别人处处训斥，可他自己经常往女生队跑，马掌都换了几副。

第二阶段。林彪上台后当然也是励精图治，他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复古”（古田会议决议），“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他不断地思考，经常下部队，下基层，林终于病倒了，且病的很厉害。六二年以后，林彪休息，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到了六四年、六五年，几个大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1、毛泽东因反刘的需要，对邓小平不满（邓倒向刘。几年不给毛汇报工作），对刘、邓控制的中央书记处不满，对书记处的大将“彭罗陆杨”不满。毛要扳倒刘、邓，就要“炮打司令部”，扳倒书记处的“彭罗陆杨”，而在“彭罗陆杨”中，最重要的就是执掌军权的罗瑞卿。毛一定是要握住军权的。毛已经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已经准备“自下而上”的孕育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军权是必须在握的。这是最简单的常识，没有孰是孰非，只有在握或不在握。那么，为倒刘而倒罗就势在必行了，这个势在必行不在于你姓罗，而在于你这个执掌军权的总参谋长跟了谁？你跟刘、邓、贺搞在一起，影响毛泽东的大业，毛还要你这个总长干什么！？具体地说，在当时，罗跟林就等于军权在握；罗不跟林，而跟贺，跟刘、邓，就等于毛军权不在握。

2、罗经过几年的观察、判断，把政治上的宝押在林的身体不会再彻底好起来，罗已“改换门庭”，投靠贺，贺又和刘、邓搞在一起，罗是不折不扣的“擅离职守”。正如叶帅所说“罗瑞卿同志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我们的同志吗？！”叶帅的话是很重的。

罗是毛、林的重臣转向刘、邓的第一人，罗是“双一”中开小差的第一人。至于贺、罗的关系，主要不在贺，而在罗。

3、当时，对罗的问题，林处在极为尴尬的境况，罗是林的老部下，批评罗理所当然，可罗又不听你林彪的，认为你身体不成，快退位了。而不少人，包括老帅，对罗的恶劣作风非常有意见，了解罗的人知道是罗所致，有的人却认为罗是仗着林彪之势。

第三个阶段。到了六五年：

1、几个老帅和军内重臣，都按捺不住了，问题反映到毛那里。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同志之间还是很顾全大局的，问题反映到毛那里，罗的问题已经很不简单了。毛也早就找人谈了话，诸

如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谢富治等人，这些人都揭发了罗，最后毛也向周恩来交了底。毛对罗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后，在解决罗的问题前，就等林的态度了，毛要看看林对自己推荐的总长究竟是什么态度？毛于六五年十一月底召叶群去杭州，叶群仓促而去。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谢富治“入伍”是毛自己决定拿掉罗的佐证，谢富治根本不是林的人，如果只是林要搞罗，谢富治绝不会象杨成武一样为林服务的。

2、叶帅、聂帅六五年七、八月份就开始“打招呼”了。这个“打招呼”绝对不是林让打的。如果只是林要整罗，毛当时不知道，叶、聂这样的政治家，且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绝对不会为林个人去“打工”的。要搞掉总长，毛的态度都不知道，谁敢打这个招呼？

3、整体情况还是林最被动。六五年七、八月份，叶帅去看望林，林这个从不起身迎客，从不主动先说话的人，见到叶来了，便迎上前去说：“对罗我还是不断刮他的鼻子！”（象小学生做检讨一样），叶帅笑着说：“我来就是主席让我告诉你，罗的问题你不要管了，由中央来解决。”这也算叶帅给林打了招呼吧。

4、叶帅给林“打招呼”后，林还是“按兵不动”，林也早已接到“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的报告，让林向毛主席报告，但林还是抻着，并没有向毛报告，寄希望于罗改正错误。正如叶帅所说，“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如果林早想整罗，他将“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的报告，顺水推舟地转呈给毛，“借刀杀人”一把，不是正好嘛！？但随着萧向荣、杨尚昆的倒台，林也知道罗的问题在毛那里快“停牌”了，林自己再不对罗表态，自己也快被装进去了。正好毛召叶群去杭州，林就势给毛写了信。（主席：有重要的情况需要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的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有必要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先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随时可到来。林彪。11月30日）。这里要注意两个情况：（1）“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早就”两个字很重要，说明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已经动了，而林没有动。（2）“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有必要向你报告”，林这时已经知道，毛不是搞罗个人，而是从刘、邓司令部的整体去考虑的，林再不对罗表态，就会影响毛的战略部署。

叶群匆忙赶到杭州，给主席汇报了几小时，汇报的是什么呢？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病号”啦，“挡道”啦，“让贤”啦，主要是讲林彪、罗瑞卿的关系。如果林早想整罗，叶群汇报时，早把“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给罗戴上了。这里不能不联系到上海会议，大家都知道上海会议时有13份揭发罗的材料，但说了几十年，也只是说有叶群的，有李作鹏给林的信，有雷英夫的等，那还有那么多材料又是谁写的呢？为什么不公布呢？笔者曾对手持13份材料又不给我看的佼佼者说，这些材料肯定不是“坏人”写的，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吧？佼佼者几乎笑破肚皮。

对罗的批判并不是个人恩怨的事。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以后，不仅北京继续开会，毛主席在杭州开更高级的会。会上一个主要内容也是批罗，参加会议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在《回忆录》中说“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六大区的书记，谁在那一边倒？谁在那里群情激愤？不是昭然若揭嘛。这个会军队扩大到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没有叶群的事，更没有“黄吴李邱”的事，他们还没有资格去风光。《五一六通知》以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也多次骂罗，有一次刘说到“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



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说罗瑞卿自杀是“跳冰棍”，这样“愉悦”的挖苦话是谁说的呢？正是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就象女跳水运动员，跳了一根冰棍。”党中央在领导批罗，毛批罗，刘批罗，大家都批罗，为什么林彪一批罗，就把“发难整罗”的帽子给林戴上？！

罗瑞卿的问题主要在罗自己。罗是很有能、很有魄力、很有干劲的人，对部队建设是有功的。但很多老同志都认为罗瑞卿的确是有错误的。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许光达、刘志坚、李天佑、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在罗的问题上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但是罗的命运不好，赶上了“彭罗陆杨”，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因此他吃了不少苦头。

罗瑞卿另一个缺点是胜骄败馁。他在台上时，飞扬跋扈，目中无人，老师都不看在眼里，他自己检讨道：“李曼村同志批判我对叶剑英同志不尊敬，我完全接受。这个问题连同对军委领导同志的关系问题，还要做检讨。”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也指出：“罗瑞卿还利用各种机会，当着下级干部面，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威信。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可是，上海会议一批他，他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而是要找毛、林去解释，周恩来都说他“太天真了”。他从卫戍区刚出来后，对儿女们说：“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林彪垮台了，他又说他一直和林彪作斗争。北京开会一面对面的批他，他就假跳楼自杀。罗这么做，给毛、林，给刘、邓两边都抹了黑，毛说他“真没出息”！（李雪峰回忆录），刘少奇说“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他的这种行动，是對抗情绪，是严重地對抗党，對抗同志们的批评。”在文革中，杨成武《大树特树》的文章，罗瑞卿看了以后，竟然在卫戍区给毛主席写了《认罪书》，说自己是一个假党员。（罗此举牵连了他的一个前妻，罗的《自传》字迹是前妻的，罗让把入党时间填为1927年）杨成武如获至宝，对着大家，手持罗的《认罪书》一挥，说：“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马上报主席、林总。”

罗复出后，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打击报复。罗跳楼后先是住在北京医院，后来周总理叫转到解放军“301”医院，并做了腿部手术。罗的事一直由杨成武管。罗重新上台后，把给他做手术的医务人员全抓了起来，连麻醉师都抓了。把院长靳来川（老少将。罗死后，在叶帅、聂帅的关心下得以落实政策）抓进秦城监狱，把副院长曹根慧抓进白庙监狱，曹在狱中做了胃切除手术，都不能出监调养，仍吃窝头、菜帮，简直惨无人道！罗死后，在聂帅的关心下，曹落实了政策。执行手术的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是我国最有为的外科专家，罗也要整他，聂帅坚决不同意，最后陆被迫离开“301”总医院，转业到地方工作。

另外，关于“四条”问题。“四条”的当事人刘亚楼、叶群都死了，但笔者认为“四条”肯定是有。“四条”的核心是“让林彪让权”。如果说叶群造谣，那叶帅、杨成武、萧华是不是也跟着造谣呢？！叶帅说：“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迟早要退出政治舞台为名，让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马，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

‘病号嘛，要像病号的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这就是“四条”。刘亚楼临死前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强烈不满。信都在，也像叶帅讲话一样，早晚要问世的。刘亚楼临死前，罗去看他时，两人大吵一架，刘的秘书何汝珍，照顾刘生活的过（记住是个怪姓）全同志，都听到了。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也有“四条”：“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几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杨成武的讲话中也有“四条”：“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几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去了，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杨成武同志还说：“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核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萧华的讲话也同样说有“四条”：“罗瑞卿要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不要再管军队的事情了。1965年12月14、15日，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几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后来，刘亚楼同志曾跑到林彪同志处，向林彪同志说了上述四条意见的大意，林彪同志当即批评了刘亚楼同志。”

罗瑞卿事件是个迄今为止尚未完全水落石出的事件，一些重要的当事人的回忆等尚未出版，还有很多重要的档案也未解密。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迟早会有真相大白之日

的。

~~~~~

【当事者说】

我们写信告迟群

• 唐少杰 •

2005年8—10月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政治部主任吕方正两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问题30周年。我采访了四位当事人之一的惠宪钧。

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现已退休。

唐：惠老师，在1975年11月初至次年9月，这短短的十一个月所经历的变化中，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无失望过？

惠：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无所谓，作为我们的国家才是重要的。我先大致把自己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完了以后看你有什么提问的。

我是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是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参军以后，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我过去在家乡读过私塾，学过的东西，我都背下来了。读书有五、六年，所以在部队我算是有文化的。解放天津后，我们算留守了，就留在天津公安局了。1951年我调到了中央警卫师。一开始中央警卫师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其实8341是在“文革”前从中央警卫师分出来的。中央警卫师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文革”之前，8341成立，就把中央警卫师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我曾在该师四团当过作战股股长。我们团负责从王府井到西城区的警卫工作。我在部队期间，表现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过去在战争年代立过两次功，到清华之前做警卫工作也立过四次功，一共立过六次功。部队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去了步兵学校，所以我在部队，总的还是比较顺的。我来清华工作时才36岁。那时我是我们师重点培养对象之一。我来清华的时候，我们的师长、政治部主任都来了，我是师作战科科长。那天不是（1968年）“7·27”嘛？当天，我参加了组织指挥。解放军一共有三百多人，有海军的，有8341的，一师的是我负责，一百多人。在清华平静了以后，我们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不同意我回去，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部队这阶段，我感觉自己从参军到成长，都是毛主席思想培养的。

到“文革”期间，自己思想上就有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期间，虽然我对于毛主席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但我总感到国家搞得这么乱，那么多老同志都被挨斗、下台，非常不理解。对我影响特别深的、感到思想上波动比较大的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在首都体育馆斗“走资派”，以彭真为首的，一一揪出来。斗的时候，我作为警卫部队领导人负责组织警卫。到了那里，造反派把彭真、安子文等圈到厕所里去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说你不要管，我说我该管的就得管，我说不许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彭真同志渴了，我说给弄点开水去，造反派他们说不行，渴了喝凉水去，把厕所的凉水管打开喝就行了。我当时感到特别难受，我说把这些领导人闹成这样，在万人大会挨斗，还关到厕所里喝凉水，很不理解。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元帅那时被关押在西山，那里也归我们团管，我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什么要求，战士反映首长想要吃点辣椒，专案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那时候，贺龙身体也不太好，一

两个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贺龙这样堂堂的军队缔造者、国家领导人，落到这种地步，多么心酸呀。还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就是罗瑞卿跳楼。罗瑞卿的住地也是我们团管的。那时候罗瑞卿天天挨斗。一次挨斗完后，一个警卫战士当天晚上就向我反映，首长昨天晚上回来情绪不好，我嘱咐说，你们注意点，要保证绝对安全。第二天我就去检查。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那个时候，他日夜睡不着觉。他把衣服脱到二楼，从三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我就感觉这几件事对我挺有影响。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信，这首先就有一个原来的思想基础。再一个，我们写信的事，这件事不是刘冰提出来的，是我们三人提出来的。从提出写信来讲，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因为那时候“六厂二校”是他们的大本营。为什么对迟、谢有这种看法，就是迟、谢接触的这些人都是“四人帮”那条线上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但知道江青、姚文元、陈伯达，他们来清华，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迟、谢都积极接待。可是，朱德总司令到清华参观，迟群不接待，他对我说，你接待去吧。我说，哎呀，朱总司令来清华，让我负责接待，这合适吗？你这个清华党委书记，你不去接待，让我去接待。迟群说，他是“老右”。朱总司令来了以后，迟群不见，我想在朱总司令走时你总可以见一见面吧，也不见。迟群说，走就走了呗，“老右”有什么可见的。迟群那个时候说，他和谢静宜是毛主席的两个“兵”，开始时还和主席有联络，后来越变越不是这个状况了。后来，他们主要同包括毛远新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打电话，还经常给我们这些人发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一大堆。

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他不是一般的闹，有时是喝酒乱闹，有时是和谢静宜吵骂。有一次，在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最后，刘冰跟我们说这个怎么弄？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对教职工的影响，我们找人把迟群干脆看住，不许他出这个门，只能在工字厅东院，让他在那里睡觉，他闹完了就睡，睡起来再闹。他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他闹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召集人，他还想开大会，我们说不能给你召集，你有事我们可以给你去做。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再一个就是对教职工，比如有一次在二教楼会议室的会议上，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位清华教职工的名，把他们都打上了反革命，点了建筑工程学系的何家辉，说这个人是想一口气吃掉社会主义；点了邢家鲤，说他是“养猫反党论”，等等。他一点到谁，被点名的人就由所在的系的人带出去。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正好有一次，吕方正、刘冰、我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决定，干脆给毛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

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以后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多少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又当面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儿，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我就想，现在我们这三个同志都提出来了，你让刘冰同志提出，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过“走资派”，他是有“前科”的，“带罪之身”的，他怎么能提出来呢？就是他本人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胆量提出来。我们提出来，我们没有“前科”，起码不是“走资派”，我们该怎么提就怎么提，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唐：但是你们一提出来，想没想到，刘冰会不会拒绝呢？

惠：我们有把握，他会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先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休息时，我们就把他拉到一边长谈。我们把迟、谢的那些行为，以及当前清华教职工的一些反映，作了概括。作为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事向主席反映，请你刘冰同志参加，他欣然说“我同意”。

唐：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迟群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要调他到国防科委去当副主任，他不去。有过这事吗？迟群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清华待着。迟群还说，能当省长、部长的人不一定能当了清华校长。

惠：他说过这话一点也不假。他说副总理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走资派”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这些话，他在我跟前经常说起。他说的话，那简直是毫不隐瞒。

唐：有一个问题，当时你们写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为什么只提到迟群而没有涉及到谢静宜呢？为什么在第二封信上，你们把迟、谢连在一起呢？是否可以说，毛主席对迟群可能还不像对谢静宜那么熟悉，毛主席收到你们的第二封信，一看到提及了谢静宜，因为毛主席比较了解谢静宜，所以他对你们的这封信大为不满。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惠：不是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们第一封信要告迟群，因为闹的是迟群，但是他有好多在学

校的做法以及在政治和经历上，跟谢静宜都有关系。我们在写第一封信之前，我们还想，我们写这封信能不能征求一下谢静宜的意见，让她和我们一起向杨德中反映情况。我们当时还有这种想法，怎么会在第一封信里涉及谢静宜呢？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把迟群搞掉，谢静宜也就无关大局了，因为她不是政治决策者，而是顺从者，就是迟群说什么，她就同意什么，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唐：谢静宜是不是能力比较差？

惠：能力比较差。凡是出头露面的，政策决策的，出点子搞坏事，都是迟群提出来的，谢静宜她是举手者。所以，在第一封信中，我们主要是反映迟群问题。另外，我们考虑现在也不能把两个人都弄上，谢静宜毕竟是主席的联络员。我们写那封信，我们是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好让主席派人来清华调查，我们再谈深层次的。我们准备由浅入深，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等着派人来找我们面对面地谈，因为我们要是把信写到深层次、写得广了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不清楚了，主席就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我们在第一封信没有涉及谢静宜，主要是反映迟群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第二封信又写了谢静宜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封信上去以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但是，这封信到了主席那里，谢静宜知道以后，她就对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派人监视我们，在领导班子有关会议上指使人反对我们，派人跟踪我们。我们就不能工作了。那时候谢静宜出面要为迟群“打抱不平”了，谢静宜把一些人组织起来，对付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写信了，就把我们基本上控制起来了。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法工作了。这事儿，我们本来是在这第一封信给她留着面子呢，其实很多决策是你和迟群两个决策的，好多做法你们是同心同德的，我们没有告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主次问题，所以这次我们写第二封信就考虑，不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不行，要反映就同时向主席反映。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我估计主席是不可能派人来的。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对我们采取措施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迟群暗中布置的。

唐：那时，迟群也知道了？

惠：迟群知道了，他们知道了，所以就采取了措施。写第二封信，我们也没有敢写深了，我们也是大致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谈起，每一句话都不要写得太重。我们想了，如果主席知道了，如果主席要是能客观一点儿，能派人过来了解，我们会把详细情况，向主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做个汇报。那个时候，至于主席怎么断，我们都心服口服了。我们告迟群的信，摆在主席的床头上很长时间，主席看了一次又一次。这个信，现在看来，主席把它与邓小平同志搞的整顿联系起来了。第二封信上去后，主席看了就重视了。毛远新等一些经常同迟群、谢静宜联系，几乎是天天电话联系。毛远新的干预作用很大。

唐：在我看到的有关材料中说，1975年11月3日下午，吴德来清华口头传达毛主席让清华就你们的两封信进行辩论的指示精神，当时你们没有想到吧？

惠：没有想到。

唐：当时还设了个圈套。在这次会上，先让大家辩论，先让你们表态，迟群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次会议故意没有公布毛主席对你们的信的具体批评。

惠：第一次辩论会，传达了主席指示精神。参加会议的总共有三四十人（实为53人，——唐少杰注）。他们挑好了地点，事先做好准备。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我们认为，这既是好消息，

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指主席看到我们的信以后，有说法了；坏消息呢，那我们可能要倒霉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到，一看吴德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通知我们，下午开会。吴德没有讲什么，他传达完了以后，说主席让大家辩论，宣布这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主持。辩论开始后，我们发言。我们首先就说，我们说的这些事，实事求是地讲，是不是真事儿？我们发言时，一帮人在那儿有组织地起哄，喊撒谎，你们说撒谎，你们知道谁撒谎？再一个，对吴德，我们说，吴德同志，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写信有什么不对？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我们有权向北京市委、向主席写信，这封信也给你这位市委书记了。我们写信同时两份一起送的。我们就问，吴德同志，这封信我们也给你送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一声不出。我们说，我们要是不对，你为什么不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看那个劲头，又哭又闹，好家伙，说你们四人反对毛主席，我们看错人了。原来一些人还是对迟、谢有看法的，但是一经鼓动，什么上当了啦，“走资派”啦，“投降派”啦，全来了。他们说，刘冰是“走资派”，你们三个是“投降派”。

唐：还有就是公布并指责你们写信一事，从那时起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际，批斗你们，这个人际关系及清华文革方方面面的问题，你当时都有什么看法？

惠：挨斗，我是最多的，因为拿我做典型，我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为什么呢，我当时考虑，第一个你撤我的职，撤我的职没关系啊，这对我是无所谓的事儿。

唐：军籍还有吗？

惠：有。你要是开除我军籍，你得报中央军委，我不怕。你撤我职，我无所谓；你开除我，就开除我。我当时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是思想有准备的。批我反对毛主席，我就没有什么可顾及的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愧对毛主席的。你们说我反对毛主席，那是你们的事，对我后人自有评论。所以，那时候斗我们，我的态度最强硬。他们把我弄到清华农场斗我，我在那儿站着。他们说，你给我坐下，我就不坐下，把我摁下。一会，他们又说你给我站起来，几个人抬我，我也不起来，就不站。我说为什么斗我，他们说你说瞎话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胡说八道。反正我不服，我们给毛主席写信有什么，我们犯什么错误了？我不服。折腾到最后，又拉回去斗，弄到清华后勤系统来斗。他们让我背诵毛主席语录，我说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不反对，但大家要一起背，你指着我的背，我也有权利指着你的背。

唐：当时，你挨打了吗？

惠：没有。那时候他们不敢打我。还有，那时在胡健（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唐少杰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问我，斗你，你有什么收获？我说，我收获大了。什么收获呢？我说，你斗我一次一小时，你得准备一个星期，而我就听一个小时，我占便宜，我说这就是收获啊。他们说，不行，决定连夜斗我。我说，你们连夜斗我，你们还得准备夜餐。我是不怕死的，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们叫我一讲，就说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我反对毛主席吗？不反对。我反对迟群吗？反对。难道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谢静宜就是反对毛主席，或者说，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迟群，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谢静宜？我说，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每次我都这样，挺有意思的。

唐：1975年11月18日，在清华、北大万人参加的有关大会上，才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对你们写信所作的批评。你听到毛泽东的这段批评以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惠：当时，我不相信。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相信。我因为对主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即使对主席感觉到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有人批评他，我都是从客观

上积极地评价主席。我想，即使一时出现误判，主席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对的。我还认为那不是毛主席批的，有可能是“四人帮”捏造的。

唐：很有可能，这个批评是由毛主席口述的，毛远新或别的什么人记录下来的。毛主席对你们的信有一句批评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即你们写信告迟群，“矛头是对着我的”，你怎么看？

惠：有可能，我们写的这两封信还没个结局，总得有个结局呀。主席考虑来，考虑去，“四人帮”这些人吹吹风，主席可能说几句，他们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可以说，我从不反对毛主席。我们对主席的感情有什么可怀疑的？

唐：你现在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是依然如初吗？

惠：是的。但是，我现在看文革那时候的事，是主席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文革”是主席晚年的错误所在。你再肯定主席，“文革”这个事儿都在。不管怎样把主席一生功过各分为“七开”和“三开”，那“三开”都是存在的。我现在都认为，“文革”是把国家搞乱了。

唐：对评价历史上杰出人物而言，功和过是不能相抵的。

惠：对，不能相抵。不能说，我有功我就可以杀人。“文革”这个事儿，你对主席再崇敬，他也是有错误的。跟着你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一些老师，你都把他们打倒了，你不知道吗？把这个国家搞到这个地步，头脑还清醒吗？

唐：“四人帮”倒台以后，给你们平反等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把你们怎么处理的？把你们放在哪儿了？

惠：让回家休息了，但很快又让我第二次回清华农场劳动。这时，因为“四人帮”倒台，迟群、谢静宜被逮捕，我再次回农场，很有意思，你到哪个班，哪个班都不要。人家说“四人帮”倒台了，你又什么了；我说我也不是什么，你们不要怕我说你们什么。我到农场劳动，就是来老老实实劳动的，什么活都干。

唐：当时你们看到了希望吗？平反大约是什么时间？是在邓小平复出后吧？

惠：反正我们知道“四人帮”倒台了，迟、谢倒台了，平反不平反，我们心里踏实。那时候迟、谢刚倒台，清华还有人来到我们面前，他不敢斗我们了，说你们等着吧。我们与他大吵，就指着他，我们的案子你能说了算吗？谁让你说了算的？吓得他赶紧跑了。

唐：就在你们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夕，在社会上流传着对“四人帮”的不满，什么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江青呵，什么毛主席指责了“四人帮”呵，当时你们能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吗？因为当时有些材料说，你们听到了关于所谓中央首长的“谣言”，就说你们也参与了所谓攻击中央首长的“坏话”，你们当时知道毛主席对于“四人帮”的不满吗？而且这些和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正好是非常吻合的。

惠：当时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你说知道太多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从未有过。我们只能从现象上看。迟群、谢静宜经常不断地在清华一些会上议论中央上层的事情，不仅议论“四人帮”的一些事情，就连毛主席的以及教育部的等等事情，都大加议论。再加上江青还不断给他们来电话，内讧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似乎都见怪不怪了。

唐：当时清华一些人，尤其是工宣队的一些人，对你们四人的批判和迫害非常卖力，到最后甚至令人觉得他们比迟群、谢静宜还积极，挺可悲的。你是怎么看的？

惠：这批人呢，感到大局对他不利，要保护自己，除了像清华政治部吴××是想出人头地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为保护自己。所以，在我们写了第二封信以后，迟、谢给他们的人打了招呼，我们也打招呼，因为有些人，迟、谢一给他打招呼，我们就知道了。迟、谢给他打完招呼，我们接着给他打招呼，迟、谢说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也说他们不是好人。一些人是不负责任的，我感觉他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我总结过，一开始斗我们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坐过“喷气式”，即两个人按着我的脖子，让我竭力低头弯腰，还让我把双手高高向后伸。在清华西主楼阶梯教室里斗我，他们是高凳子上再加高凳子，让我站在上面，“高高在上”。还有“坐飞机”，就是四个人把我抬起来往地下扔。还有“站电线杆子”，等等。我想得开，你怎么斗我吧，反正你让我站着的时候，我就让你搀着。你怎么折腾我，你折腾到最后的时候，许多群众也看不下去。我特别难过的就是1976年7月底大地震之后，一些人斗我，让我在防震棚外“喂蚊子”。别人在外面搭的防震棚都挂有蚊帐，却不让我挂蚊帐，让我只穿衬衣。那蚊子咬得可真厉害。整你什么花样都有。还有一个就是吃苦，“吃苦思甜”，让我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好的，不能给打好饭好菜，只能吃窝头咸菜之类的，就得吃这个。

唐：这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自己不能去买，是看守人员给你打的？

惠：他们给打的。人家告诉我不许吃好的。平时，喝水也没有开水，没开水，我可以上厕所，拿水壶打凉水，我也能喝，也没出事。

唐：就是来大地震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减轻对你的批斗，比如说，现在是地震时期，可以减轻批斗？

惠：没有，斗得更多了。他们没事儿，好家伙，在防震棚外面斗。他斗一次，我画一道，一共斗我214次，这就是结果。

唐：你还真不错，挨完了这么多次的批斗以后还能在清华继续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惠：“文革”结束后，原来我是想回部队的。清华新的一把手是刘达同志，他说，不行呀，你留下来是党的需要，因为你们四人写信给毛主席这件事就发生在清华，所以你们总得有一个人留在清华这儿。柳一安同志回原来的单位去了，吕方正同志也回去了，刘冰同志调走了，所以你写的回部队申请，我不能批准。我原来所在的部队本来打算我回去就给我安排新的工作。

唐：在迟群、谢静宜被逮捕之后，你见过他们吗？

惠：与谢静宜没有见过面。迟群出狱后不久，就病死了。

唐：审判迟群的时候，让没让你作证？

惠：作了。我发言了，那时迟群在场。

唐：那就是审判会的证人发言了。我问一句，迟群个人的工作能力如何？

惠：迟群这小子有能力，有点才能，在8341担任过宣传科副科长。迟群是毛主席派到清华来的，在那种环境下，他太狂，太骄傲，把握不住自己。他写字模仿主席的字体，还模仿

得特像。他大会讲话，好多时候不用稿子。这个人还是有点才。谢静宜没有什么能力，她也没什么特殊经历，就是中央机要局的一个给主席送信的机要员。她没有迟群那样的能力，客观上，我们写第一封信时不考虑她。

唐：但是，谢静宜的机会太好了，那时任过许多职务，如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团委书记，还有清华党委副书记，等等。

惠：人家就是看主席的面子嘛。有主席，她行，没有主席，她什么都不是，她懂什么呢，你让她出点子？出不了。你给她出点子，她半天还不理解呢。迟群就聪明。反正她没有。

唐：你的家人或亲属在当时受到什么牵连吗？

惠：我的家乡在辽宁。毛远新当时不是在辽宁吗，这回我出名了。毛远新说，辽宁出了一个“投降派”，所以他的亲属，你们都要把他们监视起来。我的一个妹夫就被抓了。在辽宁呢，我的事，辽宁各区、县都知道，辽宁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毛远新亲自下指示要监视他的亲属。

唐：1975年11月3日开了第一次关于你们写信的辩论会后，你们四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当时，刘冰处在你们当中的第一位，迫于巨大压力，他很快就承认“错误”了，这对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影响？

惠：主要是因为让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大加指责、批判刘冰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批评刘冰同志。还有列席的几位所谓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很快承认了错误。当时，他也没办法。

唐：当时让刘冰列席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告诉过你们吗？

惠：没有。

唐：刘冰回来也没有跟你们说？

惠：没有，也不可能。那时我们不能见面了，我们四个人，每个人被分在一个地方，每个人都由好几个人看管。

唐：你们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的原件，你知道现在存放在哪里吗？应该在中央档案馆吧？

惠：信的原件在哪儿？我也闹不清楚。反正这两封信是历史文物。

唐：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你们两份信的全文。我在清华档案馆看过一回，那是当时清华党委副书记周家骅在1975年11月18日会议上对你们的信一边念一边批的记录稿，我不知道哪些是你们写的，哪些是他批的。不但清华档案馆、图书馆、校史馆等都没有收藏你们的两封信的原文，而且清华当时绝大多数人也从未看过你们两封信的原文。这真有些遗憾。我后来从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习广编集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才看到了你们两封信的全文，并复印给清华档案馆收藏。

惠：那个信，总的来说，我们是从侧面写起，浅写深谈，我们采取这个策略。我们希望主席派人来，我们要全面汇报深层次的东西。

第一封信是吕方正起草的，我们讨论、修改；第二封信是刘冰起草的。第一封是我送去的，第二封信是刘冰托教育部的一位叫李琪的同志，通过邓小平办公室转送的。

唐：1973年夏季开了中共“十大”、1975年初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以后，迟群没有爬上去，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是个关键点。

惠：对！关键点。他的本质暴露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说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当不上教育部部长，别的台阶他又上不去，他的要害就在这里。迟群跟谢静宜的关系是又和又反。和的时候，他想利用谢静宜跟主席说他的好话；反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没当上中央委员，跟谢静宜有关系，要不怎么是你当上了中央委员，我怎么就当不上呢？就是说，你谢静宜当上了以后把我挤掉了。他怀疑谢静宜在主席面前没有给他说好话。就是这个事儿。迟群说，清华大学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大。谁能领导清华大学呢？他大会上说，下来也经常跟我们说，这是他的名言，出口就来，“我的能力是超强的”。“我能领导清华大学，我就可以当一个副总理”。

他的野心支配他好多的言论。有的言论呢，是他表达能力强。还有些呢，是他嘴上把不住门。他要是心血来潮以后，什么都可以说。你说他水平高，那他跟谢静宜闹矛盾后，在谢住室的门口小便，那算什么？就因为这个事，我们还专门找过他，批评他。

唐：我的采访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你！

□ 《炎黄春秋》 2008年第6期

~~~~~

## 【文革一幕】

###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 王文正 • 沈国凡 •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 ◇ 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7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 and 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也许是老奸巨滑的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他向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当时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他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的回答与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好还是不去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觉得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也是打不通。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这伙人一阵兴奋。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了。耳机里响起一片盲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正当这伙人惶恐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

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房佐庭回答说：“没有。”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下结论。廖祖康放下电话，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

这伙余党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严重。虽然在此之前，张春桥早就有“准备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对于上海民兵也早已进行了武装，加之控制的公安、财贸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暂时与北京形成对抗之势。可是具体情况未落实，也不好行动。

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徐景贤认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师，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这伙余党面面相觑，廖祖康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位老师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这伙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旗手”江青也同时遭到覆灭的下场。

这一分析，这伙余党立刻觉得张春桥过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张春桥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人心的丧失，力量的单薄，曾不止一次对他在上海的亲信说过，军队靠不住，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现在军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首长”，形势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女强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

吹风”。

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分成两个地方，分别按照计划，开始对控制的“文”“武”两支力量的头头进行“吹风”和“打招呼”。

#### ◇ 公安部“内线”告密

10月8日下午4时，徐景贤来到康平路小礼堂。

参加“吹风”会的有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华分社的有关人员。

徐景贤在会上将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人民日报》鲁瑛接电话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长”联系不上，房佐庭在电话里总说他“老胃病发作”等情况向这些人作了“通报”。

接着，他根据军队可能发生“政变”的猜想说：“中央电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苏修军队侵占捷克时，捷克国家电台有一名播音员听中央负责人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

徐景贤还布置了各新闻单位的保卫工作，指示要调集民兵来保卫。并要求这些人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把上海的舆论牢牢地控制起来。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会议结束后，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某副书记、福建省委某常委分别打了电话。王秀珍接着又给辽宁省委某副书记打电话，要他给当时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

由于中央和直接参加行动的8341部队，对这次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谨慎、严密，致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几经打探也未能获得可靠的消息。

下午5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让一些骨干分子列席。这次会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写作组与《红旗》杂志编辑部通电话的情况。

徐景贤在会上强调：“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我们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

散会后徐景贤回家吃饭。这时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有些沉不住气了，就跑到徐景贤的家里，找徐景贤，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由于徐景贤急着要去剧院看演出，就说：“我下午已经找报社、电台的人谈过了。国务院有几位部长在上海，今晚上看戏，我将到剧场露露面，同时摸摸情况。你们到学习室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再谈。”

徐景贤在戏院里坐了一会儿，就找了个借口离开，急忙赶回康平路。这时学习室里已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

还未等徐景贤向这伙人报告刚才的“好消息”，警卫处的康宁一就急忙向他报告，说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贤顿时大惊，忙问：“缪文金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说：“是我下午派他乘飞机到北京去了解情况的。临走我告诉他说，如果出事了，电话里就说‘我娘心肌梗死’，现在看来真出事了。”

于是，廖祖康拿过电话，亲自给江青住的那个楼打电话，不通。接着他又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处打电话，仍然不通。

“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顿时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在屋子里乱成一团。

此时，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家的电话，是徐海涛老婆接的。张家龙说：“徐景贤同志要和徐部长讲话。”徐海涛的老婆慌张地说：“他不在，去办公室了，不要再打电话了。”徐景贤在听了秘书的通话情况汇报后，猜测徐海涛也可能被抓起来了。

屋子里再次出现混乱，一伙人顿时慌成一团。

这时，康宁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来的电话，这伙人的耳朵都跟着竖了起来。

祝家耀，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副班长。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为上海五七〇三厂工人，后在厂劳资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总司”工交组、组织组工作。1973年11月起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公安部担任要职的，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不会忘记自己“成长”起来的这块“基地”，在关键时刻及时来了电话。这位“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内线”在电话里说，缪文金到京后确实进过京西宾馆。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电话里除报告缪文金的情况之外，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这是“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得到的最可靠的一个消息。这样就从公安部“内线”那里证实了他们一伙的猜测，北京的确发生了“政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个人统统被抓起来了。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张家龙拿起话筒，是刘庆棠打来的。刘庆棠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萧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們了！”

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一片混乱，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立刻条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围，然后将目光一起转向大门，生怕外面此刻突然冲进几个人来将自己抓走。看着如此混乱的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就在这间市委常委学习室里，徐景贤等人开始密谋进行武装叛乱。

□ 《百年潮》 2008年第5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